

叙述结构、角色扮演与暴力进程的演变*

——丹麦与瑞典漫画危机的比较研究

贺 刚

内容提要:瑞典和丹麦两国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制度结构和地缘政治环境,并且都发生了由于出版有关穆罕默德卡通漫画所引发的暴力事件。但发生在丹麦的事件的暴力效应比瑞典更为严重,以至于最终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暴力危机。两国在该事件上为什么会存在进程上的差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现有的研究无法对此作出清晰的解释。本文从叙述研究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以叙述结构和角色扮演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并系统地比较和说明了丹麦和瑞典漫画危机进程的差异。研究表明,从叙述与身份实践的角度分析暴力进程是一种可行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叙述结构 角色扮演 漫画危机 北欧国家 叙述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2005年9月17日,一篇名为“批评伊斯兰的深层恐惧”的文章刊登在丹麦《政治家报》上,主要报道了丹麦作家格勒·布律根(Kåre Bluitgen)为了出版其所著的儿童读物《<古兰经>与穆罕默德先知》而寻找画家绘制插图时,发现画家们因为担心遭到极端伊斯兰教徒的袭击而拒绝绘图的事件。于是,9月30日,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刊发了该报文化主编弗莱明·罗斯(Flemming Rose)的文章“穆罕默德的面孔”,文章中配发了12位画家投稿的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意在指责穆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东欧国家差异性的欧洲化进程及对中欧战略对接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YJCGJW003),同时也是笔者主持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基金项目“视觉语言叙述与恐怖主义”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3162015ZYKD06)。

斯林“拒绝融入现代世俗社会”,并且在“世俗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在漫画刊出的当天,该报就接到了几个死亡威胁电话,国内穆斯林群体也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10月19日,11位伊斯兰国家大使要求会见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这些外交官认为,上述漫画是丹麦公众和媒体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严重亵渎,并导致该问题的国际化,遂一致要求拉斯穆森对漫画及媒体上的“不敬言论”进行谴责。但是拉斯穆森认为这会干涉《日德兰报》的言论自由,因此予以拒绝。对此,相关伊斯兰国家政要纷纷发表谈话,对丹麦政府的立场及《日德兰邮报》进行谴责。^①到2005年底,一些中东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开始谴责丹麦政府。由此,漫画事件演变为一场国际危机,并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样,2007年瑞典著名艺术家拉斯·维尔克斯(Lars Vilks)应邀参加主题为“艺术中的狗”的艺术展览。维尔克斯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描绘为一只包裹着头巾并留着络腮胡子的人面狗。^②此外,在挪威维斯特富森(Vestfossen)举办的主题为“噢,我的上帝”的另一个展览上,维尔克斯同样使用了这几幅漫画。他认为,展出这些漫画的目的是“在艺术领域的边界内检验政治正确性”。在他看来,瑞典的文化艺术在反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穆斯林的价值观。^③

同年7月20日,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维尔克斯原本要进行的另一个漫画展览被组织方撤下。随后,维尔克斯计划在自己经常讲课的盖尔乐斯堡美术学院(Gerlesborg School of Fine Art)展出漫画,但是同样出于安全考虑,这一展出计划又被校方拒绝。8月18日,瑞典本土一家地方报纸《纳克人报》(Nerikes Allehanda)以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社论为主题,刊登了维尔克斯的一幅讽刺漫画,在瑞典国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争议,大量穆斯林信徒聚集在报社办公楼前抗议《纳克人报》对穆斯林的亵渎和侮辱,要求报纸和相关编辑就此事进行道歉,并保证不再刊登任何类似的图像。《纳克人报》总编辑乌尔夫·约翰逊(Ulf Johansson)拒绝道歉,认为穆斯林信徒被赋予的各种权利是一种宗教自由的展现,但也应当“允许讽刺伊斯兰最主要的象征”,因为一直以来言

^① 玉玲:“丹麦‘漫画风波’的前前后后”,《今传媒》2006年第4期,第18页。

^② David Keane, “Cartoon Violence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30, No.4, 2008, pp.845-875.

^③ “Lars Vilks Muhammad Drawings Controversy”, https://ipfs.io/ipfs/QmXoypizjW3WknFiJnKlLwHCnL72vedxjKqDDP1mXWo6uco/wiki/Lars_Vilks_Muhammad_drawings_controversy.html, last accessed on 20 September 2017.

论自由都是备受拥护和支持的。^①在报纸刊登漫画后,瑞典警方就加强了对报社主编和一些雇员的安保措施,并在收到死亡威胁后为报社人员配备了保镖。同时,作为漫画作者的维尔克斯在此后的几年间接连不断地收到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在内的各种死亡威胁信息。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瑞典漫画危机的爆发。随后,在瑞典政府的迅速反应下,通过沟通与协调,危机很快被平息。

综上,可以发现,发生在丹麦和瑞典两国的“漫画危机”起因都可以归结为带有亵渎“色彩”的漫画图像。丹麦和瑞典同为北欧国家,经济发达,政治成熟,社会稳定,也具有类似的北欧社会价值观。但在“漫画危机”进程中,为什么发生在丹麦的漫画事件的暴力效应比瑞典更为严重,以至于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暴力危机?

二 已有的解释与不足

现有关于亵渎性漫画引发暴力事件现象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主要集中于探讨漫画引发暴力事件的原因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缺少对在相似国家中引发的不同暴力效应的关注与研究。相反,在现实中,“漫画危机”事件的暴力效应不仅涉及国内安全,而且时常呈现出国内与国外以及国家之间的危机联动现象,同一暴力效应在各国表现的程度也不相同。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现有理论并没有提出较好的解释框架,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克里斯汀·阿吉斯(Christine Agius)从本体性安全的理论角度,阐述并对比了丹麦和瑞典在漫画危机立场上的争辩及其原因。阿吉斯赞同本体性安全理论的观点,认为国家的自我叙述是维护自身本体性安全和身份稳定的首要方式之一,也是自我身份的主要来源。身份与叙述是相互构建的。身份通过叙述得以形成和维持,叙述通过身份得以凸显。当然身份是关系性的,阿吉斯认为,身份的形成不仅仅依靠稳定的自我叙述,而且需要通过区别于他者的叙述与实践。阿吉斯据此从地区和国家层面分层次讨论了丹麦和瑞典在漫画危机中持不同立场的原因。在地区层面,两国都是北欧国家,具有共同的北欧价值观和自传体的身份叙述,如性别平等、现代性与社会福利主义等。但是,两国在国家层面对北欧价值观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导致对待穆斯林移民和群体的态度与政策出现差异。穆斯林群体作为他者,给两国都造成了本体性上的不安全感。丹麦的民族主义更加强烈,因此以约束性、同化性的政策对待穆斯林群体,

^① “Muslims Protest Swedish Newspaper’s Cartoon of Prophet Muhammad”, <http://www.foxnews.com/story/2007/08/31/muslims-protest-swedish-newspaper-cartoon-prophet-muhammad.html>, last accessed on 10 September 2017.

在话语叙述上强调穆斯林的敌对性。瑞典则以自由、民主和多元文化为身份叙述的基础,所以对外来穆斯林群体的政策更加包容和多元,在话语叙述上强调容忍性。因此,基于本体性安全的需求,两国在对待穆斯林群体和漫画危机上所展现的立场和叙述具有差异性。^①

二是斯蒂格·诺尔斯泰特(Stig A. Nohrstedt)从右翼民粹主义视角出发,比较了丹麦和瑞典漫画危机中媒体在构建和传播国内仇外情绪与话语时的作用。诺尔斯泰特认为,当前丹麦已经处于晚期现代社会,也即“威胁社会”。媒体是该社会构建与发展的基本载体。因此媒体的逻辑也是该社会的基本逻辑。诺尔斯泰特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媒体对“威胁社会”的建构逻辑。在宏观层面,媒体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般性的民族主义通过媒体扩散为激进的民族主义;二是“威胁社会”中的政治通过媒体的强化表现出三个特征,即威胁和危险主导着政治修辞,政治变化由坏的情境引发,政治和社会认同逐渐呈现出一种脆弱和易于暴露的个体形态且缺少相互信任。以这三个特征为宏观背景,诺尔斯泰特对比了穆罕默德漫画危机中丹麦的《日德兰邮报》和瑞典《纳克人报》对漫画危机的报道和构建,并对它们各自公开发表漫画的动机进行了分析。诺尔斯泰特认为,两家媒体都认为言论自由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可能会被一些观念、批评和讽刺艺术所触怒,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公共性辩论和讨论中,保护其中一方不受冒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代民主和言论自由与“坚持对宗教情感予以特殊关照”是矛盾的。诺尔斯泰特据此认为,相比《纳克人报》而言,《日德兰邮报》的报道更具目的性和进攻性,其保护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动机更为明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自事态发展的进程。事实上,无论是丹麦还是瑞典媒体,其动机都在于恐惧穆斯林群体对言论自由和民主机制所造成的冲击。^②

三是卡塔琳娜·欣瓦尔(Catarina Kinnvall)和保罗·内斯比特—拉金(Paul Nesbitt-Larking)将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场所营造概念结合起来,认为场所营造也是一种安全化过程,并以此对比了漫画危机中两国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反应和场所营造策略。欣瓦尔认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都会寻求本体性安全的“锚定”,以应对身份和存在意义上的结构性或话语性威胁。在丹麦、瑞典等西方国家中,“穆斯林”是移民中的少数群体,这些人远离自身宗教文化所在的祖国,进入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国度中,在身份认同意义上是一群“无家

^① Christine Agius, “Drawing the Discourses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Im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Danish and Swedish Cartoon Cris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2, No.1, 2017, pp.109-125.

^② Stig A. Nohrstedt, “Mediatization as an Echo-Chamber for Xenophobic Discourses in the Threat Society: The Muhammad Cartoons in Denmark and Sweden”, in Ruth Wodak, Majid KhosraviNik and Brigitte Mr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Politics and Discourse*,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309-320.

可归”的人。因此,场所营造成为穆斯林群体在异国他乡重构其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实践策略。所谓场所营造,是指某个群体在异质文化中创造一个区域或者聚集成群,通过商店、餐厅、少数群体市场或其他符号描绘出本群体的边界,进而营造一种文化和身份的归属感。欣瓦尔认为,在瑞典和丹麦国内,无论是少数群体还是多数群体都在实施这种场所营造的策略,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动力就是寻求各自身份认同的稳定。据此,欣瓦尔着重比较了两国在漫画危机中的场所营造策略。丹麦在对待少数群体时更加强调同化政策,例如其政治家的右翼思想更加浓厚,而瑞典则更加强调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平等,其政治家的思想也更加包容,因此丹麦的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之间营造的场所彼此更加分离,其国内漫画危机的暴力程度也比瑞典高。^①

可见,对丹麦和瑞典漫画危机的现有比较研究已经较好地分析了两国在漫画危机中的暴力进程,也对国内面临的问题如政治结构和暴力原因进行了研究。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但是,既有研究并没有深入挖掘两国暴力进程演变的动力原因与差异。无论是从本体安全理论还是媒体作用,抑或是对场所营造理论的关注,都是从一个核心概念出发,采用过程追踪的方法展开论述,缺少理论构建和相关理论未来普遍运用的基础。场所营造理论虽然能够解释两国在暴力程度上的差异,但正如欣瓦尔自己认为的那样,场所营造理论并不能单独解释这些差异,需要结合本体性安全理论和安全化理论。^② 因此,该分析视角显得庞杂且臃肿。

鉴于此,笔者认为,穆罕默德漫画危机事件本质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符号现象,因此其分析视角也应从符号与身份实践角度出发,以叙述与身份的相互影响为基础。据此,本文构建了情节叙述结构与角色扮演的分析框架,认为丹麦与瑞典在漫画危机中不同的暴力演变进程受到各自叙述结构与角色身份扮演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三 叙述结构、角色扮演与暴力进程的演变

叙述研究主要关注叙述结构对身份认同和身份实践的建构和影响,而对“叙述”作用于实践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德塞托认为,叙述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叙述的首要功能在于创建一个上演各种行动的“剧院”和“剧本”,以此为人们即将采取的行动“提供空间”。正如德塞托所说,“它开启了一块领域,允许具有危险性或偶然性

^① Catarina Kinnvall and Paul Nesbitt-Larking,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De) Securitization: Place-Making Strategies in Denmark, Sweden, and Canad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28, No.6, 2010, pp.1051-1070.

^② *Ibid.*, p.1052.

的社会活动的发生”。因此,叙述先“行”于社会实践,以便为后者打开疆域。^①所以本文秉持的是语言建构主义的话语(叙述)优先原则,但同时注重话语(叙述)对实践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然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行为体的叙述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并不否认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而是弱化实践以突出话语(叙述)的优先性。当行为体在参与某项活动或者进程时,首先是通过某种叙述建立起即将实践的空间,并为自己的实践提供相应的行动剧本和合法性。^②

关于叙述结构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构成剧本叙述结构的第一原则。^③因此,情节成为任何叙述语法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作为一项基本假定,无政府状态就表现出不同的情节叙述结构。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社会中的主体间关系是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无政府状态,其情节也从悲剧进化到喜剧。也正因如此,无政府状态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如何解释无政府状态就成为需要面对的又一关键问题。事实上,正如林瑞谷(Erik Ringmar)认为的那样,这依赖于我们如何讲述关于无政府状态的故事及其编织的情节。^④例如,在悲剧式叙述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中,行为体之间以消灭和被消灭为目的,其行为意图充满敌意,容易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实际上,这样的解释路径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国内社会的主体间关系。^⑤叙述结构类似一种行动的背景知识或主体间性的文化结构,引导和制约着行为体之间的行为。叙述结构依据情节的不同,具有不同的角色主体和行为方式。

从具体的情节叙述结构来看,如果仅仅是开始、高潮与结尾的简单剧情并不能完美地演绎一篇故事叙述,为了将这三个阶段统合进一个故事中,必须要用情节予以串联。要对情节予以研究,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分类。但是,叙述结构中的情节十分复杂且难以穷尽其类别。事实上,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早就对此有所研究,并将叙述结构中的情节分为四种类型:浪漫的、讽刺的、喜剧的、悲剧的。^⑥弗莱的分类基础随后被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运用到解释叙事理论和历

^①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25.

^② 贺刚:“叙述、参与与实践与地方政府的对外合作——以广西参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例”,《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期,第75页。

^③ Aristotle, *On Poetics*,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2, p.32.

^④ Erik Ringmar,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1, 2012, p.8.

^⑤ Nadim Khoury, “Plotting Stories after War: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Negotiating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2017, pp.1-24.

^⑥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史再现问题的研究中。^①再其后,逐渐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纳。当前国际关系学中已经涌现出大量以此分类为基础的研究。^②因此,本文将采用弗莱的分类基础。

具体来看,浪漫情节(romantic plots)是指故事中存在英雄和恶棍两种角色并将国际关系描述为英雄成功征服恶棍,并最终赢得嘉奖的故事。浪漫情节是童话故事、史诗和神话的素材,也是政治故事的素材。该情节的轨迹表现为一种不断进步的态势,从开始到结尾的情节都是向前推进的,当然也会存在起伏的状态,如英雄受伤了,正直的人逝世了或者主角犯了一个错误。但是,这些挫折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剧情的过渡,其目的是为了凸显最终的胜利与超越。在浪漫情节中,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十分突出,并且赞美前者,贬低后者。在国内层面,这体现在对不同群体的划分和态度。因此浪漫情节会抑制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谈判,这在族际群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③

悲剧情节则是另外一种情节叙述结构。情节的展现通常表现为存在一个英雄角色,但这个悲剧的英雄是由于反抗既有的自然或社会秩序而失败并被摧毁,同时既有的秩序重新恢复了原样,最终无人能逃脱既有秩序的统治。这个英雄虽然具有良好的意图,但事实上,意图的憧憬越好,失败的可能性也会越高。悲剧情节留给观众的感受是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对英雄陨落的同情。在国际政治中,悲剧情节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思想之一。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国家永远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意图,使得国家之间极易陷入“安全困境”进而爆发战争,因此悲剧情节不断上演。悲剧情节常被西方主要大国用于对冲突意义的塑造。对国际社会中的悲剧,西方大国通常会就各种战争、冲突、种族屠杀等悲剧表达同情和怜悯之意,但同时也强调这些战争性质的残暴性和无解性,因此仅仅是利用悲剧情节塑造了自身的人道主义立场,而无实质性的援助措施。^④

除此之外,悲剧情节的另一种表现是从一个积极欢乐的故事转变为消极悲伤。这样的转变是由于剧情中的英雄承认了自己的傲慢行为,最终导致英雄光环陨落。因此,悲剧中的英雄承认自己的过往罪行成为悲剧情节的关键,而成为悲剧的原因在于

^①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Hayward R. Alker, *Rediscoveries and Reformulations: Humanistic Method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Riikka Kuusisto, “Comic Plots as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4, 2009, pp.601-626; Erik Ringmar, “Inter-Textual Relations: The Quarrel over the Iraq War as a Conflict Between Narrative Typ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1, No.4, 2006, pp.403-421; David Scott, *Conscripts of Modernity: The Tragedy of Colonial Enlighten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Yehudith Auerbach, “The Reconciliation Pyramid—A Narrative-Based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dentity Conflict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30, No.2, 2009, p.299.

^④ Riikka Kuusisto, “Comic Plots as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p.611.

英雄无论怎样悔过都不能扭转自己过去的罪行。在政治领域,通常表现为政治官员代表国家承认本国过去所犯的罪行并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内疚与歉意。^①

喜剧情节方面,其基本的情节轨迹是从消极到积极的故事转变,这与悲剧情节恰好是相反的。在文学剧情中通常表现为相爱的两个人最终结婚,家庭成员最终和解等。因此,令人愉悦的预期结局使得喜剧情节叙述通常会朝向一个重归于好的境界。在喜剧情节中通常也会存在一位英雄,这位英雄会遇到一些不寻常的冲突和不同的障碍,但是这个主角在尝试不同的解决方式之后,最终获得成功并以一个盛大的庆祝宴会作为结局。事实上,喜剧情节叙述并不意味着嘲笑别人或是对手的遭遇,也不是要竭尽所能将自我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存在误会的主角双方共同寻求弥合方案的剧情。因此,喜剧情节中的他者通常被描述得更具包容性,也更易创造出彼此之间的一种共性。如在成为敌人之前我们曾经是邻居,我们之间可能存在误会等言辞。

在对世界政治事件进行解释时,喜剧情节叙述反对将特定事件结果视为某种确定的“命运论”,以此防止事件的进一步恶化与扩散。罗伯特·艾维(Robert Ivie)认为,三个因素使得喜剧情节成为可能:批判性的审视自我行为;构建同质性的对手;使政策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②因此,由于具有自我批判性和弹性政策,自我与他者在喜剧情节中更具调和色彩而非绝对的对立。也正如此,喜剧情节叙述结构是将冲突与敌对置于一种非确定性的情境,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手段处理情节事件中的各种波折。

最后一种情节结构是讽刺叙述情节。由于讽刺情节是对世界上的事物进行讽刺,因此它总是“寄生”于其他三种情节上,其目的是讽刺并颠覆现有社会秩序,而非建设性的。由于浪漫叙述情节常常用于描述战争事件,因此讽刺情节一般建立在浪漫情节的基础上并用于反浪漫、反战争。通过对浪漫情节中的英雄进行形象颠覆处理,讽刺情节使英雄角色突然出现令人尴尬和羞耻的剧情转换,以此打消英雄的虚荣做作。作为一种情节叙述结构,讽刺性叙述在国际关系的合作与冲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集中体现在对冲突和战争的平息上。讽刺情节与喜剧情节一样,对角色更具包容性,通常将战争中的主战派描述为战争中的共同受害者,以此讽刺主战派发动的战争,引发主战派对战争的反思,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平息战争。

综上,由于身份是关系性的和主体间性的,因此持续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与实

^① Nadim Khoury, "Plotting Stories after War: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Negotiating Identity", p.10.

^② Robert L. Ivie, "Evil Enemy Versus Agonistic Other: Rhetorical Constructions of Terrorism",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25, No.3, 2003, pp.181-200.

践是国家身份认同构建的关键要素。^① 正如麦克斯威尼所认为的那样,集体身份并不是自动给予的,而是通过故事或者叙述构建的,依赖于集体持续性的构建能发挥团结和归属感作用的叙述。^② 总之,国家身份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经由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完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复制和生产。^③ 正因如此,国家如何叙述自我与他者的身份与角色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群体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与故事叙述中的角色互动模式一样,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不同的叙述情节赋予自我和他者不同的互动关系、角色定位和行动目标。因此,情节结构不仅定义了“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与他的关系”等存在性问题,同时也框定了行为体行动的方式和导向。当然,情节最终是靠角色的互动实践得以展现,扮演哪种角色是由情节结构所规定。情节中的主角依照情节结构,通过规定的角色扮演,表演出整个故事叙述,从而为观众展现出完整的剧本。^④

对于不同的情节叙述结构,英雄这一主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在国际关系中所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依据情节结构的冲突特征,本文将叙述结构分为两种类型:排他性情节叙述结构和包容性情节叙述结构。在上文四种情节结构中,浪漫情节的叙述结构需要清晰地分辨出内群和外群,并认为内群是善良、正义的且应该受到保护,外群是邪恶、敌对的,因此应该被消灭。所以浪漫情节在四种叙述结构中的排他性色彩最为强烈,也常用于分析和描述历史中的冲突事件。它通常包含暴力元素,其过程一般为英雄不断憧憬自己能够战胜恶棍,并取得最终胜利。因此,在国内社会环境中,历史形成的排他性情节叙述结构,会使以“英雄”身份定位的国内统治势力与“邪恶”的反对势力之间更容易以浪漫情节展开互动,英雄以裁决者自居,发号施令并且拒绝妥协,相信自己会最终战胜邪恶。

如果浪漫情节叙述意味着冲突的特征,那么化解或者调停这些冲突就需要改变情节结构,并选择新的情节进行叙述实践。通常,妥协或包容是化解冲突的有效方式,因此所选择的情节结构以及其中的角色也应具有这些特征。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喜剧情节和讽刺情节具有这样的特性,但讽刺情节的包容性通常通过讽刺对手显现,通过把“高高在上”的对手置于主角同样的悲惨结局中从而达到讽刺效果,同时也展现出一

^① Bahar Rumelili, “Identity and Desecuritisation: The Pitfalls of Conflating Ontological and Phys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Development*, Vol.18, No.1, 2015, p.56.

^②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3.

^③ Ruth Wodak, Rudolf de Cillia and Martin Reisigl,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Discourse & Society*, Vol.10, No.2, 1999, p.153.

^④ Erik Ringmar,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1, 2012, pp.1-25.

种“包容”。所以,讽刺情节中的包容同样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和敌对性,而非真实意义上的包容。在喜剧情节中,并不需要杀戮和剧烈的痛苦剧情,主角双方更容易展开谈判并达成和解,包容性得到最真实的体现,其“皆大欢喜”的预期结局使得冲突的化解过程中角色双方更易采取包容和让步的策略,并最终实现和解。^①因此,在国内社会环境中,历史形成的包容性情节叙述结构,会使以“英雄”身份定位的国内统治势力与对手之间更容易以喜剧情节展开互动,英雄以协调者自居,这是一种存在误会的主角双方共同寻求弥合方案的剧情。

据此,依据叙述结构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对暴力进程解释的两个假设:一是当国内叙述结构呈现出排他性叙述结构,浪漫情节结构会逐渐加强,主角英雄更倾向于以裁决者角色应对敌对的他者,并且英雄不愿妥协,始终相信自己能够战胜邪恶势力,因此更容易助长暴力;二是当国内叙述结构呈现出包容性结构时,喜剧情节结构会逐渐加强,主角英雄更倾向于以协调者的角色对待他者,行为体之间倾向于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因此更容易缓和暴力。(见表1)

表1 叙述结构视角下的暴力进程演变

叙述结构	角色扮演	暴力进程的演变
排他性叙述结构 (特征:浪漫情节叙述)	裁决者	助长暴力
包容性叙述结构 (特征:喜剧情节叙述)	协调者	缓和暴力

注:表由作者自制。

在本文涉及的案例中,丹麦和瑞典在漫画危机事件中显然具有不同的情节叙述结构和角色扮演进程,从而对暴力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和后果。接下来,本文将以情节结构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丹麦和瑞典在漫画事件中各自的角色实践及其对事件发展的影响。

四 丹麦与瑞典漫画危机中暴力进程的比较

2005年9月和2007年7月,丹麦和瑞典相继发生漫画危机事件,事件起因都是由

^① Riikka Kuusisto, “Comic Plots as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pp.601-626.

于出版“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漫画而引发,但无论是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事件本身的暴力程度,相比瑞典而言,丹麦漫画事件所引发的暴力进程不仅持续时间更久,程度也更剧烈。

作为北欧国家,北欧的价值观念与规范是构成丹麦和瑞典两国身份认同的基础要素,如性别平等、现代性、社会福利主义、宽容以及积极的国际主义等。^① 这些关键性的身份“标签”是北欧国家在经济、劳务、法律、教育、文化、安全等方面合作的基础,并最终通过北欧理事会得以制度化。尽管具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制度结构和地缘特性,丹麦和瑞典在各自的国家身份构建上依然有不同之处。正如上文所述,丹麦和瑞典在漫画事件中所展现的不同进程正是由于两国在国家身份认同建构进程中形成的不同情节叙述结构造成的。不同的情节叙述结构框定了两国在漫画暴力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身份和预期,并进一步影响了各自在处理与穆斯林群体这一“他者”时的策略与偏好,最终形成了差异性的暴力程度和演变进程。因此,依据前文的分析和假设,要系统考察两国的情节叙述结构,需要分析两国历史实践所形成的叙述结构特征。如果叙述结构是排他性的,那么可以推断该情节更趋于向浪漫结构演变。相反,如果叙述结构是包容性的,同样也可以推断该情节更趋于向喜剧结构演变。从情节结构来看,无论是丹麦还是瑞典,在涉及漫画危机这一事件中,其中主角“我群”是丹麦和瑞典两国,而另一主角“他群”则是两国国内外的穆斯林群体。在漫画危机事件中,两个“主角”间的互动实践主要涉及两国国内的移民政策、本国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群体间的政策互动等。^②

(一) 丹麦的叙述结构、角色身份与暴力进程分析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伴随移民及其安置问题越来越多,丹麦政府逐渐收紧了本国移民和难民法规。丹麦的公民管理制度实行的是一种同化政策。对新移民来说,想要申请公民身份必须学习丹麦语以及公民的价值观和文化。丹麦原住民族被政府视为一种族群共同体,族群文化的存续也更多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并通过将移民融入丹麦文化价值观来实现。对丹麦而言,文化同质化的理念是国家身份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丹麦社会针对穆斯林族群制度的文化和制度基础。^③ 2001 年在右翼政党丹麦人民党的支持下,丹麦成功组阁自由保守型联合政府,并将反穆斯林观念转变为“对移民的恐惧”这一概念,以便在公开宣传中更能被丹麦人所接受。因此《日德兰邮

^① Christine Agius, “Drawing the Discourses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Im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Danish and Swedish Cartoon Crises”, p.5.

^② Göran Larsson and Lasse Lindekilde, “Muslim Claims-Making in Context: Comparing the Danish and the Swedish Muhammad Cartoons Controversies”, *Ethnicities*, Vol.9, No.3, 2009, pp.361-382.

^③ Ulla Holm, “The Danish Ugly Duckling and the Mohammed Cartoons”, DIIS Brief, Copenhagen, 2006, p.4.

报》决定出版关于穆罕穆德的漫画也并不是一种偶然,实际上,此前关于文化、移民与宗教的辩论早已在丹麦社会中“生根发芽”。^①

因此,在丹麦的文化价值观中,穆斯林群体始终是一个“他者”,是一种排他性的存在。在“新民族主义”的影响和鼓动下,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排他性话语已逐渐在丹麦的制度和文化中显现,其中的话语修辞从直接针对族群转向社会层面更为隐晦的文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丹麦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通过对异质文化的排他性叙述展现出来。通过媒体的宣传,越来越多的普通丹麦人和政府官员相信移民群体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丹麦,通过“我们才是居民”、“丹麦人”、“土著的丹麦人”、“天生属于这方土地的”等修辞将自身塑造成为同质性的文化共同体。^②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丹麦人开始沉迷于自己的身份、民族和国家符号中,反对和贬低穆斯林群体这一“他者”。在这种对立的结构中,丹麦的穆斯林群体逐渐拒绝政治对话和接受民主的可能性。同时,这些穆斯林群体正在从公共生活空间中隐退,转而进入虚拟的穆斯林共同体,并希望回归遥远的国土上最“纯正”的穆斯林家园。

结构的排他性也影响了丹麦穆斯林群体中的年青一代。当前伊斯兰组织和运动已经能够通过宗教身份标签动员跨国性的穆斯林群体,并为身在异国的穆斯林构建一种群体归属感。因此,年轻的穆斯林相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更倾向于将自身首先归为穆斯林群体,而非丹麦人。其中一些年轻的穆斯林更是将自己与父母所在国的传统文化相隔离以追求“纯正的”和“正统的”伊斯兰信仰。^③对全球穆斯林共同体(Muslim Ummah)的认同意味着在丹麦国内,丹麦民族身份与穆斯林身份的界限进一步固化,同时也意味着想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和世俗的国家观念取代伊斯兰宗教在这些年轻人心中的地位也愈发困难。此外,国内的穆斯林学生群体也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有效的跨国沟通工具,通过网络构建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以此为穆斯林的全球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可能。

可以发现,在丹麦境内,自我与敌对“他者”的区分十分明显,且主流叙述倾向于赞美前者而贬低后者。其情节结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作为英雄角色的“纯正的”丹麦人期望成功征服国内的“恶棍”和“异类”,并最终赢得大众赞赏的故事。英雄的民族主义、浓厚的民族优越感和自信的民族政策使得丹麦的情节叙述呈现出浪漫情节结

^① Per Mouritsen, “The Particular Universalism of a Nordic Civic Nation: Common Values, State Religion and Islam in Dan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Tariq Modood and Ricard Zapata-Barrero eds., *Multiculturalism, Muslims and Citizenship: A European Approach*, Routledge, London, 2005, pp.70-95.

^② Peter Hervik, “The Danish Cultural World of Unbridgeable Differences”, *Ethnos*, Vol.69, No.2, 2004, p.258.

^③ Søren Chr. Lassen and Kate Østergaard, “Tværnationale Bevægelser og muslimeri Danmark”, in Ulf Hedetoft, Bo Petersson and Lina Sturfelt eds., *Bortom Stereotyperna?: Invandrare och Integration i Danmark och Sverige*, Halmstad: Makadam Förlag, Sweden, 2006, pp.201-238.

构。丹麦政府也更倾向于扮演一种英雄式的裁决者角色,以期主导整个剧情的发展。

作为浪漫情节中的裁决者,丹麦国内正统势力始终以审判者的话语和视角对待穆斯林等少数民族。丹麦宪法规定,所有居民都具有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实际上,在丹麦国内宗教并不平等。少数宗教虽然能够自由结社,但不能获得国家的补助,其中伊斯兰教只能在少数宗教活动中享受部分有限的免税政策。^①此外,由于丹麦主导的政治话语是基于“同化”理念,试图将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同化并制度化。因此,丹麦政府并没有给予穆斯林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有效的正式渠道,这也导致穆斯林与政府之间缺少沟通。

2005年的漫画危机事件初期,《日德兰邮报》文化主编弗莱明·罗斯(Flemming Rose)有针对性地接连出版了12幅嘲讽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和相关文章,意在表达对丹麦本土穆斯林的批评,认为他们是自傲的、落后的,更是对公共领域的威胁,漫画的出版旨在警告他们并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②

危机事件发生后,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一直拒绝对事件作任何评论,直到危机转变为国际事件,拉斯穆森才作了简单回应,即“丹麦政府不会嘲笑穆斯林”。此外,拉斯穆森也拒绝接见伊斯兰国家驻丹麦的大使,拒绝接见丹麦穆斯林组织的代表并且也没有拜访相关的宗教场所。批评人士认为,丹麦政府不应将漫画危机视为外交重大事件,但拉斯穆森立即予以拒绝,并发表声明称:“丹麦不会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国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会始终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③事实上,这与前任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的观点类似,尼鲁普·拉斯穆森在“9·11”事件后的一场移民代表会议中说道:“让穆斯林妇女能够嫁给她们想嫁的人,尊重民主理念,不能把古兰经置于丹麦宪法之上”,并要求与会者向丹麦宪法宣誓。加尔比·施密特(Garbi Schmidt)据此认为,尼鲁普·拉斯穆森的言辞虽然比较委婉,但含蓄地将国内穆斯林群体指向了恐怖主义、性别不平等、东方文化的愚昧落后以及民主的叛徒等身份标签。总之,丹麦官方认为,相对于丹麦的世俗主义或其他宗教来说,伊斯兰教较为缺乏理性,不应该被特殊照顾,该群体也有义务去学习并采纳丹麦社会的规范和政治文化。^④因此,丹麦政府的强硬做法加上穆斯林群体的抵抗,将危机进程不断推向高潮。

① Kate Østergaard, *Danske Verdensreligioner-Islam*, Copenhagen: Gyldendal, 2006.

② Flemming Rose, “The Face of Muhammad”, *Jyllands-Posten*, September 2005, p.3.

③ “Dansk Seniorforsker; Dansk Selvglaedegørdetsvært for os at Sætteosindiandrekulturer”, <https://globalnyt.dk/content/dansk-seniorforsker-dansk-selvglaede-gor-det-svaert-os-saette-os-ind-i-andre-kulturer>, last accessed on 18 September 2017.

④ Garbi Schmidt, “Islamic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Young Muslims; The Case of Denmark,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24, No.1, 2004, pp.31-45.

2006年1月26日,沙特阿拉伯召回驻丹麦大使,两国的外交关系开始恶化。迫于压力,同年1月30日,《日德兰邮报》主编卡斯滕·朱斯特(Carsten Juste)署名的两封公开信发表在报刊官网上,事件暂时得以平息。但令人意外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的媒体开始站出来为丹麦报纸“打抱不平”,认为媒体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权,纷纷转载这些漫画。对欧洲媒体的这些做法,全球伊斯兰国家首脑和宗教领袖纷纷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并采取了抗议行动。巴基斯坦参议院通过决议,对欧洲媒体的做法予以“最强烈的谴责”。科威特和约旦政府召见丹麦大使,要求给予解释。利比亚更是关闭了驻丹麦大使馆。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等9国也从超市撤下了丹麦的货物以示抗议。在2006年2月的第一周,丹麦在贝鲁特、大马士革、雅加达以及德黑兰的驻外使馆受到攻击。在此期间的骚乱和示威中,全球估计有多达250人丧生。外交大臣佩尔·斯蒂格·默勒(Per Stig Moeller)声称,这是丹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以来面对的最大的国际危机事件,“漫画危机”不仅造成了丹麦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损害了丹麦的国际形象,特别是作为第三世界人道主义支持者的形象。^①直到2006年3月,危机才逐渐平息。

(二) 瑞典的叙述结构、角色身份与暴力进程分析

二战后,在瑞典的身份叙述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较少,而以实用主义色彩和国家的现代性为主,集中体现在其福利国家的制度建设中。^②因此,瑞典的移民制度也更具包容性,对移民权利的考量更多是基于是否具有居留权而非他们的出生国身份。基于平等原则,1968年政府法案给予移民住房、教育、就业和医疗等权利,1975年,移民又被赋予了居住地所在地区的公民投票权。瑞典人对于能够接受和帮助移民感到十分自豪,并且在官方宣传和话语中,瑞典政府也常将自身叙述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并通过各种措施进行贯彻。^③例如,移民在学习瑞典语的过程中被鼓励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母语;民族社区团体也会通过给予资金补贴的形式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建设,促进文化之间的平等;各种党派也几乎一致地对移民政策持积极的态度。^④

^① [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② Pertti Joenniemi, “Disputed Democratic Identities: The Case of Danish-Swedish Discord”, in Viatcheslav Morozov ed., *Decentring the West: The Idea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p.183.

^③ Magnus Dahlstedt and Fredrik Hertzberg, “Democracy the Swedish Way? The Exclusion of ‘Immigrants’ in Swedish Politic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30, No.2, 2007, pp.175-203.

^④ Göran Larsson, “Sweden”, in Göran Larsson ed., *Islam in the Nordic and Baltic Count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59.

丹麦严苛的移民政策和同化政策与瑞典自由且多元文化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瑞典,移民享有双重国籍身份,没有入籍测试和效忠宣誓。^① 瑞典更加注重劳动力市场中包容的移民政策与经济整合的关系,而非关注民族主义。总之,文化相对主义在瑞典人看来是比传统文化更为重要的价值体系。这在其政治精英层面也有体现,精英们普遍认为政府需要有效控制利益群体之间的辩论和政治对抗,因为这会严重破坏社会稳定。^②

在漫画危机事件中,虽然很多观点认为瑞典政府也在向“右”转变,但实际上,瑞典的右翼思想仅仅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而且其仅有的党派代表是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该党于2010年进入议会,占有5个席位,并在2014年的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派,得到12.9%的支持率。与丹麦的人民党类似,瑞典民主党高举“实现真正民主的大旗”,贴上代表最普通的瑞典人民、性别平等和福利国家等身份标签。然而,在瑞典主流政治中,瑞典民主党才是真正的异类和“他者”,其他主要党派都拒绝与他们在议会中共事。^③

基于多元文化的官方价值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起,瑞典的移民政策逐渐成形。在80-90年代,瑞典始终坚持非常开放的移民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其国内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与丹麦同化性的移民政策不同,瑞典的移民不仅被鼓励继续保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而且政府还支持移民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建立各种移民自治组织,允许发行以移民本国语言印刷的报刊和书籍等。2006年,随着自由保守政府的上台,移民政策也逐渐被质疑,但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导向没有改变,福利社会、平等主义、司法公正等政治原则依然主导着瑞典的政治文化。^④ 事实上,在瑞典反穆斯林情绪还是存在的,尤其在“9·11”事件后,突出表现在就业市场上对穆斯林的歧视和受限的市场准入。^⑤ 但是,相对于丹麦,瑞典对待移民的同化思想较弱,这使国内的移民似乎更能以普通公民身份界定自身,而非转向宗教或者其他身份标签。同时,瑞典的多元文化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平息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对立极化问题,而且能缓解不

^① Diane Sainsbury, “Immigrants’ Social Righ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elfare Regimes, Forms of Im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y Regim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16, No.3, 2006, p.237.

^② Christine Agius, “Drawing the Discourses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Im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Danish and Swedish Cartoon Crises”, p.9.

^③ Anders Hellström and Peter Hervik, “Feeding the Beast: Nourishing Nativist Appeals in Sweden and Denmar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15, No.3, 2014, pp.449-467.

^④ Gunnar Alsmark, “Integrationspolitik på Svenska”, in Gunnar Alsmark, Tina Kallehave and Bolette Moldenhawer eds., *Migration och tillhörighet: Inklusions-och Exklusionsprocesser i Skandinavien*, Gothenburg: Makadam Förlag, 2007, pp.53-98.

^⑤ Göran Larsson, “Muslims in the EU: Cities Report on Sweden”, EU Monitoring and Advocacy Program, Open Society Institute, 2006, https://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sites/default/files/museucitiesswe_20080101_0.pdf, last accessed on 17 September 2017.

同宗教之间的张力。

可以发现,在瑞典境内,自我与敌对“他者”的区分并不十分明显,且主流叙述倾向于以包容性的话语描述穆斯林“他者”,并注重创造出彼此之间的一种共性,以求消除误会,朝向一个重归于好的结局。其情节结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作为英雄角色的瑞典人遇到一些不寻常的冲突和不同的认同障碍,但这个主角在尝试不同的解决方式之后,最终获得成功。多元文化的理念和包容性的族群政策使得瑞典的情节叙述呈现出喜剧情节结构。瑞典政府也更倾向于扮演一种英雄式的协调者角色,以期化解矛盾,迎来满意的和解结局。

2007年7月,瑞典漫画家拉尔斯·威尔克斯(Lars Vilks)创作了一幅穆罕默德的漫画像,将穆罕默德的身体画成狗的身体,并最终被瑞典当地的小报《纳克人报》出版,由此引发了一场漫画危机事件。伊朗公开谴责了漫画的出版,瑞典在海外的部分公司和威尔克斯本人也收到威胁警告,“基地”组织更是公开悬赏追杀威尔克斯,瑞典前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的木偶塑像也在抗议浪潮中被烧毁。与丹麦漫画危机相比,瑞典各方的反应更为迅速,危机事件也很快被平息。

作为喜剧情节中的协调者,瑞典的国内正统势力以平等、包容、对话等方式处理与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关系。虽然《纳克人报》出版了讽刺性漫画,但这些漫画早已存在,并且是漫画艺术家维尔克斯的个人表达,而非官方使然。同时,《纳克人报》所发表的社论文章也具有包容性,认为:“自由社会的穆斯林群体应该逐渐学会容忍和接受别人对其宗教符号的指责,同时瑞典政府也应该努力维护穆斯林群体的宗教权利,并平衡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①事实上,《纳克人报》更加相信,公共领域的威胁并不是来自瑞典本土的穆斯林,而是来源于丹麦漫画危机所引发的普遍的安全焦虑。^②

在政治精英层面,前首相赖因费尔特首先表达了漫画对穆斯林群体造成伤害的悲伤心情,但同时也表明自己无权干涉出版自由。赖因费尔特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使瑞典国内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和谐相处,相互尊重。我们正朝着这个目标推进。同时,我们也要支持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这是我们的立国基础。”^③此外,赖因费尔特还到访了斯德哥尔摩主要的清真寺并就事件的处理征求各方

^① Lars Ströman, “The Right to Ridicule a Religion”, Nerikes Allehanda, 19 August 2007, http://sourze.se/2007/09/04/ridicule-on-freedom-of-expression__65590, https://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sites/default/files/musecityesswe_20080101_0.pdf, last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7.

^② Göran Larsson and Lasse Lindekilde, “Muslim Claims-Making in Context: Comparing the Danish and the Swedish Muhammad Cartoons Controversies”, p.371.

^③ Fredrik Reinfeldt, “Reinfeldt om Muhammedprotesterna”, Svenska Dagbladet, 31 August 2007, <https://www.svd.se/reinfeldt-om-muhammedprotesterna>, last accessed on 18 September 2017.

意见。同时,他也接待了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大使,并迅速联系瑞典驻相关国家的大使馆,要求向各国说明“瑞典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瑞典国内是平等的,并且瑞典的宪法并没有规定报纸上应该刊发什么”。^①实践证明,这些象征性承认的举措有助于平息穆斯林的抗议活动。例如,厄勒布鲁市穆斯林文化中心负责人贾马尔·拉哈穆迪(Jamal Lahamdi)虽然领导了针对《纳克人报》的抗议活动,但他认为“没有理由再抗议了,首相组织的对话会议收效良好并且是一个好的开端,我希望现在就应该结束了。”^②

瑞典国内的穆斯林组织也迅速采取各种措施,避免危机的升级,宣称这是瑞典国内的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在危机初始阶段,他们积极与瑞典外交部门合作,及时沟通意见。尽管穆斯林组织内部也有部分异议人士想要将抗议活动升级为国际事件,但大多数人还是优先选择对话而非暴力与抵制。此外,瑞典穆斯林群体中的年轻人还自发建立了一个名为“和平行动者”的网络,对有关“伊斯兰恐惧症”和偏见的言论进行回应,并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这些都表明,在瑞典的政治文化中,多元、包容、对话和协商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事实上,威尔克斯的漫画对穆斯林群体及其宗教来说确实是一种诽谤和亵渎,并进一步扩大了瑞典境内的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但事件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在瑞典,政府注重瑞典式的多元文化,反穆斯林的政党在主流政治中也是被边缘化的,官方倾向于通过合作与对话的形式,逐渐吸纳、融合外来宗教和文化少数族群。

总的来说,穆斯林群体的文化、规范与施动性都以宗教为中心,与北欧价值观中的很多元素并不相容,因此在丹麦和瑞典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始终是一群外来的“他者”。丹麦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将本国文化视为更高级的文化,而将伊斯兰文化视为“未开化的”,因此其歧视和排他性要强于瑞典。在瑞典方面,尽管也宣扬多元文化价值观,但穆斯林群体同样也被视为对民主和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威胁。^③

但是,情节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两国正统势力所扮演的角色和预期的不同。丹麦政治文化中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排他性色彩浓厚,反穆斯林政党丹麦人民党也影响了丹麦的政治话语结构和话语文化的制度化,拉大了移民与丹麦民族主义之间的距离,促使双方以敌对的视角看待彼此,并在情节结构上表现为浪漫情节,一方是扮演裁决者的

^① Josef El Mahdi, “Reinfeldt och fredsagenterna parerade Vilks-krisen briljant”, Svenska Dagbladet, 7 October 2007, <https://www.svd.se/reinfeldt-och-fredsagenterna-parerade-vilks-krisen-briljant>, last accessed on 18 September 2017.

^② Göran Larsson and Lasse Lindekilde, “Muslim Claims-Making in Context: Comparing the Danish and the Swedish Muhammad Cartoons Controversies”, p.372.

^③ Catarina Kinnvall and Paul Nesbitt-Larking,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Globalization: Muslims in the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15.

丹麦,另一方是顽强抵抗的穆斯林群体。因此,浪漫情节下的角色互动实践主导着丹麦漫画事件的整个发展历程。《日德兰邮报》的漫画出版后,丹麦国内的危机事件不仅迅速激化,甚至扩散到国外,成为国际性事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结束。在瑞典,多元文化和包容性政策占主导,同时反移民政党被主流政党政治所边缘化,穆斯林群体能够享有较为平等、自由的表达权利,统治势力与穆斯林等少数族群的关系更为融洽。因此,在情节结构上表现为喜剧情节,一方是协调者,另一方是被误解的穆斯林群体。所以,喜剧情节下的角色互动实践主导着瑞典漫画事件的发展历程,整个危机进程也较为缓和。

五 结语

本文主要以国际关系中的叙述与身份实践为基础,比较了丹麦和瑞典两国漫画危机事件进程中差异性的暴力演变进程。通过对两国漫画危机事件的梳理,提出了叙述结构、角色扮演与暴力进程演变的解释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可以发现,丹麦的情节叙述结构展现出的是浪漫情节,扮演的是裁决者角色,其结果是引发对立,激化矛盾,促使暴力进程愈演愈烈。瑞典展现的则是喜剧情节,扮演的是协调者角色,通过包容性政策,不断与穆斯林群体进行沟通 and 协调,最终迅速平息了危机。两国危机事件的系统比较验证了该框架及其解释效力。因此,情节叙述与角色扮演能够成为解释暴力演变进程的有效视角。当然,本文并没有对其他相关案例进行检验,也没有对情节叙述、角色扮演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变量变化假设,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贺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责任编辑:莫伟)